

# 简析严歌苓笔下的“父亲”形象

杨小兰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摘要】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两大类:“老移民父亲”和“新移民父亲”。他们身份迥异,背景悬殊,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与传统的父亲形象相比,这些父亲在作家笔下都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与威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心理缺陷,从而显示出作家这样的一种创作倾向——“审父(弱父)情结”。严歌苓用冷静的笔调为我们细致地展现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异域中是如何因为男性地位、身份的变化而逐步异化的过程,更集中探讨了这一变异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高度。

【关键词】移民 形象 审父 文化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6-0107-03

作为新移民小说的代表人物,严歌苓是创作最积极、作品最多的移民作家之一。从1989年旅美开始,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她创作了近三十部长短篇小说,并频频在国内外获奖,被誉为是“多产多收”的优秀华语作家。

严歌苓的小说主要有两类题材:一是追忆故国的社会与人生;二是叙写移民的生态与心态。相较而言,后者的比重与影响都大于前者。在她的移民小说中,既有描写早期移民生活图景的作品,如《扶桑》、《风筝歌》、《魔旦》等,也有描写新移民生活情状的作品,如《少女小渔》、《无出路咖啡馆》、《拉斯维加斯的谜语》等。但无论写什么题材、从何种角度写,均体现了严歌苓独有的人性关注以及对人生在世最基本权利的真切关怀。作为华人后裔,可以说严歌苓对她笔下的华人移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与感情。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严歌苓小说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来入手的。的确,就创作本身而言,严歌苓的小说确实带有明显的女性文学色彩,她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对女性人物的塑造,通过诸多女性形象的刻画,来表现女性作为弱者曲折动人的性格命运,并进一步揭示女性深层的文化特性及其在中西方文化碰撞时无可避免的性格、心理冲突。严歌苓自己也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情化,女性主义是什么我不清楚,清楚了就无法创作。文学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群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比如安娜·卡列尼娜、苔丝等等。这却是男作家手下的女性形象,男性作家都如此关注女性形象,何况女性作家。”<sup>[1]</sup>但与此同时,二元对立的叙事和意象结构模式往往又是文学作品最基本的构架,天/地、阴/阳、雄/雌、理性/

知觉、精神/肉体、节制/欲望、主/客是相互存在的,无论它们的存在是明显的、正常的,还是被作家有意隐藏的、颠覆的。因此,即使男性人物在严歌苓的作品中不是以核心人物而存在的,但我们也无法完全抹掉男性形象所透露出的种种信息。严歌苓心中及文本中的男性想象世界肯定是存在的,通过对那些男性人物形象的解析,既可以探究作家的文化视角,也能重申作家的两性观。

众所周知,在中国,父亲历来是权威象征的代名词。中国宗法制度的“国家化”使父权与君权结合,君王成为政治化父亲,“父子”关系就演变成“君父”与“臣子”的政治关系,强调的是血缘的维系、宗族的发展和君臣上下尊卑的礼仪。因此无论社会如何变革与进步,父亲的权威是绝对的。关于父亲权威的规定与体现在中国的文化经典中比比皆是。从孔圣人的“正名”口号到孟子的“五伦说”,从《礼记》中对父亲的权威解说到《说文》中对“父”字精髓的阐释,无一不体现了这一点。正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父亲就是天,是绝对不可以触犯和悖逆的。

与中国不同,西方文化中的父亲并没有无上的权威,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多半是对立的,这在西方文学典籍中也有诸多体现。希腊神话中以天神宙斯为代表的奥林匹斯神系对前奥林匹斯神系的替代,实则就是对父亲权威成功的挑战。“弑父”也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一个母题,这在东方是绝不存在的。可以说,中国与西方的“父亲”在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作为高大的、受人尊敬的、神圣的男性,“父亲”形象在严歌苓的移民小说里,又是如何被描述的呢?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

\* 本文为“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级重点学科项目”成果。

\* 作者简介:杨小兰(1973-),女,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

两大类：老移民父亲和新移民父亲。他们身份迥异，背景悬殊，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商人老板，有的是无业游民。但无论是谁，这些父亲形象在作家笔下都失去了原有的高大、神圣，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心理缺陷，从而显示出作家这样的一种创作倾向——“审父（弱父）情结”，即归还父亲们并不伟岸的身影，有意识地刻画出他们在异域为生计卑微挣扎的苦痛之景，可以说，严歌苓笔下的父亲形象和“父亲”这一词语的原有内涵大相径庭。在其小说中，血缘的父亲形象失落在强势文化的凝视之下，作为精神而存在的父亲形象更是轰然倒地，荡然无存，他们只是一群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缺席者，一个模糊而沉默的群体。

在短篇小说《风筝歌》中，作为父亲的“梅老板”是20世纪初移居海外的老移民。他的家庭从表面上看，与所有普通传统的中国家庭如出一辙。小说一开头就颇有深意地作了如下介绍：“一位富有、俨如王侯的老父；一位娴熟、集人间美德之大成的慈母，然后必定有一位美丽、娇巧、被宠若掌上明珠的小女。”<sup>[2]</sup>照此看来，“梅老板”显然符合中国传统父亲的所有特征：事业有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然而一个白人流浪汉“肯特”的出现，使我们看到这个父亲的另一面。在西方人“肯特”的眼里，这位体面的梅老板，只是“有张痢疾病的青脸和贼似的小眼睛的”中国佬，与其他中国移民并没有多大区别，“温和”、“隐忍”的性格使他任“肯特”在古董店里“肆意妄为”，改变原有店铺格局、有意的将华人主顾换为白人主顾等。但在“肯特”准备让其女儿出来为古董店做广告时，这位“老好人”终于爆发了。情急之中，“梅老板”第一次将妻子“海伦”和她的民族称为“鬼佬”，“海伦”并没有抓狂，只是面色冷峻地用了一句繁复的客套话表示不满，这种冷静和优雅恰恰表现了她无意识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表面看“梅老板”在家中处于统治地位，在唐人街社会里也处于主流阶层，但实际上其男性的权威早已不在，因此在面对“海伦”和“肯特”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优越感时，他内心感到阵阵的刺痛。甚至在女儿眼里，他也是“他们中国人”而非“我们”，在强势文化眼中，“梅老板”不过是无数“他们”中的一个，是弱势文化群体中的一个。至于唐人街，也不过是被排除于西方主流社会之外的一座孤岛，是保守、落后、肮脏与罪恶的代表，是“双重边缘化的文化‘飞地’”<sup>[3]</sup>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颇值得我们玩味，“梅老板”每年都送女儿一个风筝，却坚决不允许女儿去学旱冰，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风筝飞得再高再远，自己都可以用线将它控制，旱冰鞋则不行。但最终，女儿这只最美的“风筝”却“断线”了，她无视父亲的权威跟流浪汉“肯特”私奔，最终却没能摆脱被抛弃的下场。“梅老板”想用自己的威严、自己的爱，将女儿像风筝一样守护在臂湾里，可在已被生活环境和强势文化同化的女儿面前，他只能无力地成为一个失败的父亲。

如果说《风筝歌》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失败的老移民父亲形象，那么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有了改善的新移民父亲形象是否发生了相应地转变呢？《冤家》中的“张先生”《屋有阁楼》里的“申沐清”等，都是新移民父亲的代表。在作家笔

下，他们同样被重新解构、重新设置了。

《冤家》中的父亲自始至终是处于幕后的，如一幅被收藏的画，所有的印象全来自于他人的评论。他被作家设置到了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边缘境地。女儿虽见过父亲数次，但对父亲的了解，基本上来自母亲，而母亲眼中的父亲形象却是这样的不堪：留学国外的同性恋男人，卑鄙无耻，与她的结合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就连女儿也不过是父亲家族为向社会提供一个伪证而留下的丑恶产物。父亲的第一次正面出场亦显得猥琐而可怜：“头发秃掉了一块，剩下四周圆圆的一圈，同正宗的教父一个发式。他站在她的西班牙式的拱门洞中，身上没有一样值钱的，最值钱的那个博士后学位，也让她看不出来。”<sup>[4]</sup>

按理说，女儿有如此不堪的父亲，本身是很痛苦的，她应该痛恨父亲，但事实远非如此。小姑娘非但不听母亲的劝阻，固执地用自己攒了很长时间的零用钱为那个从未爱过她的父亲买了副价值500美元的金框眼镜，而且在罗生（母亲的情人）的圣诞party上，为了父亲不惜与客人发生争执与冲突，最终酿就了一场悲剧。作为一部以女性叙事为主体的文本，小说中的父亲形象虽然是隐匿的，却又是所有矛盾所有冲突的焦点，并成为害死女儿的罪魁祸首。在文本中，原本是保护与被保护、疼爱与被疼爱的父女关系，在现实中却演变成了一种反向力量：柔弱、幼小的女儿轻易看穿父亲背后的虚弱，企图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父亲，而父亲在女儿受到伤害时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其身上的男性特质和雄性力量都在异域社会中被阉割、抹煞了，成为了一个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受到重创的“缺席者”。

谈到父亲与女儿的关系，应该提到一个名词——“厄勒克特拉情结（又译恋父情结）”，它最早由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与“俄狄浦斯情结（又译恋母情结）”相互对应。弗洛伊德认为：“宗教、社会、道德、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sup>[5]</sup>因此在作家的小说创作中，父女关系/母子关系的叙写要远比父子关系/母女关系复杂，所占的份量也更多。在异域社会中，因文化与环境的突变，“恋父情结”也从一种正常的心理限度被迅速放大变形，从而制造了一幕幕家庭悲剧。

在小说《屋有阁楼》中，“申沐清”就是一个因女儿出国留学而移民的父亲形象。与其他的男性移民形象相比，作为父亲，他没有属于自己的现实位置，与整个社会联系的唯一纽带也只有女儿而已。由此，他的不安全感、孤独感相对其它移民而言则更为明显，对女儿的依恋也就更强烈，甚至逾越了正常的父女感情。小说中写到“申沐清”夜夜都听见女儿“申渥”在受到白人男友“保罗”的性虐待时而发出的哭叫声，在梦中他则看到幼年的女儿对他哭叫。尽管医生证明那只不过是他的臆想而已，并暗示他可能对女儿有超越父女伦理之外的感情时，他仍无法停止，并变得更加敏感。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他与其说是威严的父亲，倒不如说是可怜的孩子。他完全失去了父亲的地位，必须事事都听女儿的，看女儿的脸色行事，而女儿又在“保罗”面前极为胆小、卑微。所以即使他听到女儿的哭喊时，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质问“保罗”，在压力和痛苦的双重折（下转第116页）

方面,作品有其建成作品主体的、处于“内”与“外”的边缘,这个“边缘”即作品的唯一的基准所在,既是唯一的,又是可分割的。所以,导致当独特性始终存在时,绝对的独特性就永远成不了事实,成不了客体或存在本身。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逻辑所导致的自相矛盾的后果。因此,任何作品的独特性都在于它独特地表现独特性与一般性两方面。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文学批评所追求的独特性,绝不是唯一的和恒定的,也不是一次性的,“独特性”是一个标记,一个区别于自身的内在标记。文学的“独特性”存在于写作与阅读中,正是在写作与阅读之间的抗争中,批评家重复、肯定并尊重原作者,同时又将其隔离别处,从而显示出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德里达认为:“在我们既不知道法是谁,也不知道法是什么的地方,也许正是文学的发生之地。”<sup>[9]</sup>所以,我们欲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完全的认知关系,愈想知道文学是什么,就愈背离文学的本身。德里达指出:“在愚弄法的一瞬间,文学超越了文学。它在划分法与非法的那条线的两侧。”在德里达这些近似含混的语言中,我们体悟出他所表达的意义,即在意义不断建立、超越的边缘间,文学之为文学得以产生。

此外,文学文本并不是一般性的文本,这种文本的最一

般的总体结构作为“本体论的”或“下部基础的”应当尽量避免,它只能提供一种特殊的线索,教给我们更多的、有关一般写作范畴的内容,否则将陷入同一性的形而上学中。同时,要看到文学是通过自己制造事件,体现出违背、转化因而又制定自己的构成法之中建制的。文学事件由于其“不可能”性而很难加以证实,没有一个内在的、十分确定的标准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不是文学本身,它只是文学分享和借用的特点,是在其他文本中也能找到的“什么是文学”的构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力图超越传统的文学本质观,不断追问文学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对文学自身的探寻正如他的解构主义所理解的,是一种不断分延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德里达.哲学的边缘[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
- [3]德里达著,赵兴国等译.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上接第108页)磨下,“申沐清”最终精神崩溃,在小阁楼里孤独地喝药自尽。小说中的这位父亲是异域社会中无地位无身份父亲的真实写照,是无数作为眷属的移民父亲生存现实的缩影。梦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主体地位从中心一下子退到了边缘;家庭的期望与重担使这些昔日的佼佼者们丧失了天生的优越感;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揆弃使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天天地消失,直至人格重创甚至精神崩溃。他们既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也找不到新的精神依托,最终酿成一个个悲剧。

由上述两类父亲来看,严歌苓的小说是有鲜明的“审父情结”的。她用冷静的笔调为我们细致地展现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异域中是如何因为男性地位、身份的变化而逐步异化的过程。从更深层面上看,严歌苓对父亲形象地描写还有明显的文化思考的痕迹,可以说小说中的父亲所经历的生存危机与心理危机也正是不同文化冲突、冲撞的结果。它体现出了作为移民一代的父亲在进入异国他乡之后,是如何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环境里又如何被异质文化排斥、疏离的生存事实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严歌苓对于父亲形象的解构和颠覆正是她对中西文化交锋、冲撞思考的结果体现,这其中既包含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与僵化的批判,也包含了她对西方文化的狭隘与排他的反思,这就使其小说超越了一般移民小说生存关注

的写作层面,而具有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庄园.严歌苓访谈[A].华文文学[J].2006(6):100.
- [2]严歌苓.风筝歌[A].白蛇·橙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262.
- [3]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7.
- [4]严歌苓.冤家[A].白蛇·橙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248.
- [5]弗洛伊德.图腾禁忌[M].中国民间出版社,1986:192.
- [6]陈思和主编.中国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7]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 [8]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 [9]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0]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1]陆薇著.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